



遗址出土宋代琉璃构件



板桥镇遗址一处饭店后厨中成摞堆叠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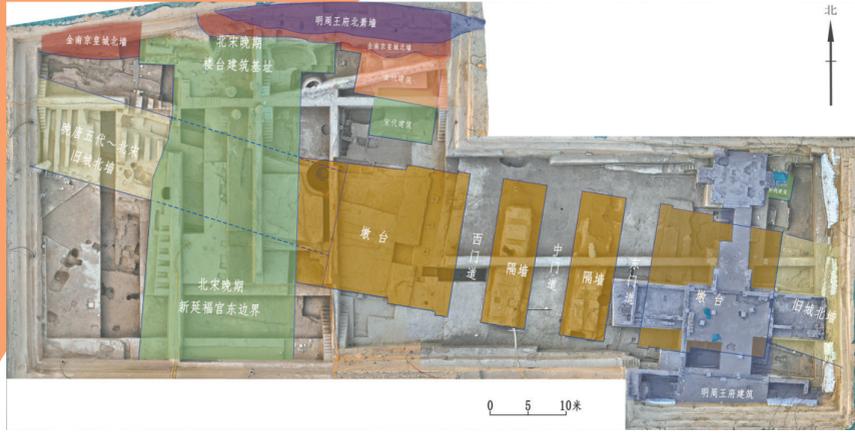


板桥镇遗址中集中出土的器物



庆成门遗址整体格局

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考古新收获



景龙门遗址正射影像图

北宋东京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城区，由外城、里城、大内三重城垣围合。北宋东京里城沿用唐汴州城，因此又称旧城。北宋时期又称之为阙城。景龙门为里城北墙中门，旧名酸枣门，始建于隋唐时期，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改名为兴和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改名为景龙门。《东京梦华录》记载：“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南壁其门有三：正南曰朱雀门，左曰宝门，右曰新门……北壁其门有三：从东曰旧封丘门，次曰景龙门，次曰金水门。”景龙门北望外城北墙通天门，南与里城南墙宝门相对。

工作概况

2023至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景龙门遗址并对其进行了发掘，已清理发现唐至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门、城墙、建筑、道路、水井、农田等遗存70余处，出土文物2100余件。景龙门、里城北墙、延福宫东墙等遗存的发现为北宋东京城复原研究确定了关键节点。

主要收获

晚唐五代至北宋早中期遗存：唐代晚期，宣武军节度使李勉筑汴州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下诏修筑外城，汴州旧城作为里城继续沿用，三重城垣相套的布局在此阶段形成。此次考古发现晚唐五代至北宋早中期遗存主要有里城北墙及城内道路等，城内道路被北宋晚期延福宫东墙叠压截断的层位关系印证了北宋晚期修福五位之前，大内北侧并非禁苑区域的历史事实。

里城北墙略呈西北东南走向，城墙东段被北宋晚期景龙门所打破。已揭露区域长约41米，最宽约16.8米。平地起夯，墙体夯土残高约3.3米。通过对墙体及附近地层的解剖可知该段城墙始建于晚唐时期，后经不断修补筑，沿用至金代彻底废弃。结合现有考古成果及文献可确定该墙最初为汴州城北墙，五代北宋时期又作为东京里城北墙一直沿用。

城内道路位于里城北墙南侧，与城墙走向大致平行，南半部延伸至发掘区域外，路面宽度不详。延福宫东墙叠压于其上，东段北部被景龙门基槽打破。路土堆积最厚处约1.7米，路面可见若干西北东南向车辙痕迹。

北宋晚期至金代遗存：北宋晚期，徽宗于大内拱宸门外大肆修筑苑囿景观，包括艮岳、延福五位、撝芳园、景龙江、上清宫等。景龙门也在这一时期由李诚主持重修，成为密建禁署的重要礼制建筑 and 交通节点。据《北山集》收录的《宋中散大夫知制诰州州管勾李承甫内功使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李诚墓志铭)记载：“(李诚)以景龙门、九成殿，其迁朝散大夫。”

延福五位又称新延福宫，政和年间开始修建，其规模仅稍逊于大内。《宋史》记载：“初，蔡京童贯、杨戩、贾深、蓝从熙、何訢等分任官役，五人者因各为制度，不务沿革，故号‘延福五位’，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东直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昏、雨泽者也，而晨昏门出入最多。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

金灭北宋后，贞元年间改汴京为南京，海陵王完颜亮大修南京宫室。至金宣宗时期，又迁都至南京，为加强军事防御，重修了南京子城并筑皇城。景龙门、里城北墙在这一时期完全废弃。

遗址考古发现北宋晚期至金代遗存主要有景龙门及其附属建筑、延福宫东墙、楼台建筑、金南京皇城北墙等。景龙门夯土基础内出土瓷片最晚至北宋晚期，可知景龙门重修年代下限为北宋晚期，与李诚墓志铭记载相符。考古发现延福宫东墙紧贴景龙门西侧，印证了《宋史》记载延福五位“东直景龙门”相关内容的真实性。

景龙门位于发掘区东南部，一门三道式布局，城门外由墩台、隔墙及门道构成。城门通阔约60米，门道进深约19.3米。两墩台残存有少量包砖，包砖墙向上逐层错缝露跟砌筑。门道两侧保留有地袱基础，碎瓦与土逐层夯筑，隔墙为素土逐层夯筑，推测门道应为排叉柱抬梁式结构。门道宽度相同，均为5.6米左右，门道内不见路面及铺装物，仅存夯土基础，门道两侧亦不见地袱，仅存夯土基础。两隔墙宽度亦相等，均为4.7米，夯土残高出两侧门道0.1~1.2米不等。

城门外墩台北侧各有东西朝向的建筑基址1座，其中西侧建筑残存有夯土基础、包砖、碌碡、散水等，根据碌碡间距可知建筑进深为1间约3.8米，建筑北部



北宋晚期景龙门复原模型



明周王府别院隔墙

延伸至发掘区外。两建筑位于城门外侧，相对而立，与城门外地层年代相同，当属城门外值房类附属建筑。

延福宫东墙位于景龙门西南侧，大致呈南北走向，向南延伸至发掘区外，北半部叠压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旧城(里城)北墙之上，二者叠压关系与《宋史》记载“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内容相符。墙北半部夯土与景龙门西墩台连为一体，南部打破里城北墙内侧道路，已揭露部分长约37米，宽约16.7米，夯土残存厚度约1.5米，夯层、夯窝痕迹明显。

北宋晚期楼台建筑位于发掘区北部，已揭露部分呈平面呈北宽南窄的“T”字形，北半部叠压于金南京皇城北墙下并向北延伸至发掘区域外。夯土基址外侧有包砖墙，向上逐层内收，包砖墙外侧残存有少量碎砖散水。台基北半部东西宽约25.6米，残高约2.2米。台基南部夯土与延福宫东墙夯土连为一体，叠压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旧城北墙之上。

金南京皇城北墙位于发掘区北部，北半部延伸至发掘区外，结合勘探情况可知墙宽8~10米，夯层、夯窝痕迹明显，残高约2米。上部叠压有明周王府北萧墙夯土墙体，向下打破北宋晚期地面及北宋晚期楼台建筑基址。

明代遗存：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改封其第五子朱橚为周王，以开封作为其封国，周王府建于宋金故宫旧址之上。周王府建筑布局与宋金皇宫差别较大，由外向内由萧墙、紫禁城三重垣围合，紫禁城为王府核心区，主要宫殿建筑多集中于紫禁城内，苑囿、宗庙等多分布于紫禁城外。

遗址明代遗存位于周王府东北部，后宰门内东侧，遗迹现象包括北萧墙、农田、水井、道路、祠庙、别院等。据《如梦录》记载：“又，后宰门里有土山，名亭辇庄，亦有殿宇。麦熟观农，使子孙知稼穡辛苦。”

周王府北萧墙横贯遗址北部，叠压于金南京皇城北墙之上，方向与其一致。萧墙已揭露部分长约33米，仅存夯土墙基，残高约3米。

农田、祠庙等位于发掘区西部，萧墙以南。农田共发现4块，其上方被明末崇禎十五年淤沙掩埋，平面近似方形，局部田垄清晰可辨。

祠庙位于遗址中北部，贴萧墙而建，单进院落，主体建筑包括南门楼、西门楼、主殿、厨房、水井等。主殿位于祠庙院落北部正中，内有砖砌须弥座式神台。祠庙外发现道路2条，分别通往祠庙南门与西门。

别院位于遗址东部，叠压于景龙门东门道及东墩台之上，坐北朝南，多进院落式布局，主体建筑包括厅堂、耳房、甬路、厢房、方亭等。

价值及意义

景龙门遗址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填补了北宋东京里城考古的空白。

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景龙门夯筑、砖墙砌筑等工艺与《营造法式》壕寨、砖作制度相符，可视为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典范。

遗址考古发现的唐至明代不同时期城墙及建筑遗存地层关系明确，时代特征明显，清晰揭示了开封从唐代汴州城到五代、北宋、金代都城，再到明代府城的历史变迁过程，为研究中华文明延续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执笔:王三营 万军卫)

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水道，孕育了沿线众多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江苏淮安正是其中之一。自2021年淮安市出台“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前置政策以来，淮安地区新发现了20余处与运河相关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绝大多数处于城区范围内。其中庆成门、新路和板桥镇遗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突出反映了本地城镇兴起、发展与变迁，及大运河淮安段在漕运、盐运和关榷方面的独特功能与历史地位。2021至2023年，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联合徐州博物馆对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

庆成门遗址

庆成门是淮安旧城的西门。旧城始建于东晋义熙七年，最晚在唐代中后期，淮安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宋元时期经历多次重修，明代时旧城有四门，其中西门称望云门，清晚期改称庆成门。在明清时期，由于清江浦运河的开凿，西门以运河为池，成为进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依其拆毁前旧地名，将此处称之为庆成门遗址。

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里运河与文渠交汇处，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2022年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现城门外2处，城楼台基1处，西城墙2段，瓮城1处，均为夯土包砖结构。夯土层厚15~20厘米，为碎砖瓦层和黏土层交替夯筑。包砖由外皮和“填馅”两部分构成，“填馅”用残砖砌就，用砖杂灰。外皮包砖均采用“线道砖”做法，使用白灰和糯米粘合。

主城门坐东朝西，长20.8米、宽5.6米，底部可见三层砖铺路面。城楼台基由主城门隔为南北两段，总长70米、宽20米，地面部分残高2.4米，是包砖墙保存最好的区域。瓮城保存有北、西、南三面城墙，城墙宽8.5米，地面部分残高约2米。瓮城总体南北长66米、东西宽36米。其城墙夯土叠压在残损的城楼台基包砖之上，时代略晚于城楼台基。瓮城位于瓮城北墙处，呈南北向，长10.6米、宽5.2米。残存底部包砖，包砖宽1.7米，残高2.35米。门内由早至晚共留存有7层叠压的砖铺路面。最晚期路面旁侧有一条直通西侧运河大堤的斜向小路。西城墙位于城楼台基南北两侧，揭露面积较小，仅存地下部分。其中中段残长5米、宽11米；南段残长2.5米、宽11米。

在主城门东侧的城内区域进行解剖，发现了从六朝至清代连续的地层堆积和相应的建筑遗存。建筑遗存包含有唐代墙基1处、铺砖面1处，宋代铺砖面1处，明代土墙1处、铺砖面1处、清代排水沟1处、房址2处。此处文化层厚可达6米。

遗址内出土器物共80余件，有陶器、铭文砖、磁石、抱鼓石和石刻建筑构件等。其中南宋铭文砖有“建康都统司”“建康府”“楚州西”“楚州水军”等，明代铭文砖有“盐城县里下”“拾壹”“肆陆”等。

初步判断庆成门遗址中的主城门和瓮城均修建于明代，瓮城年代略晚于主城门。正德《淮安府志》中有关于瓮城的明确记载，可知至少在正德四年(1509年)之前，淮安府旧城西已存在瓮城。根据主城门处的解剖情况，在明代的夯土基槽以下还发现了五代时期的城门外夯土和包砖墙，受解剖范围限制，其布局尚不清楚。瓮城下部发现了宋代夯土、结合文献中“修月城以里之”的记载，推测宋代时此处可能存在有月城。此次发掘揭示了明清时期淮安城西门的整体格局，为研究唐宋楚州城到明清淮安城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线索。

新路遗址

新路所在区域处于黄河和运河之间，靠近明代时运河通往黄河的仁、义、礼、智、信五座车盘坝。明初时在此附近设置淮北批验盐引所。到弘治时期，淮北盐运分司移设，使得大量盐商荟萃于此，此地遂达于极盛。万历十七年(1589年)，黄河改道草湾河，淮安新城北门外的这段黄河故道被改为运盐河。嘉靖万历以后，黄河开始全流夺淮，新路、板闸一带都曾多次遭遇洪水侵袭。

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新路村，处于淮安旧城西北，向东隔城西路为现河下古镇，西北距板闸遗址约3公里，总面积3.46万平方米。遗址整体处于黄泛堆积之下，2023年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揭示出一处保存完整、格局清晰的街巷类遗址，包含房址34座、道路8条、灶10座、沟13条。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条横贯发掘区西北至东南的主干道路(L1)，道路两侧为店铺及民居。道路揭示部分长75米、宽4米，两侧有排水沟。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外部用砖包砌，中间高两边低，呈鱼脊形，局部还有碎卵石补修。该路做法考究，称为砖铺慢道，推测应作为货运道路使用。对该处道路进行解剖，在土层发现有更早期的砖铺路面。两期路面之间还有两层路路面存在，表明其曾经经历多次修葺，沿用时间较长。

遗址内出土器物有370件，有陶器、木器、金属器、建筑构件、钱币等。大多为残破器，以青花瓷器为主，器形有碗、盘、杯等。青花瓷器，大多有底款，以吉语款为主，有“万福攸同”、“长命富贵”、“富贵长春”等，还有少量纪年款。器物时代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发掘揭示的新路遗址主体时代为明代晚期，废弃于明代

运河明珠·江苏淮安城市考古新收获

徐州博物馆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末期。据《续纂淮安志》记载：“板闸之有新路，由来旧矣……明万历年，榷使陈公讳梦琛者，实修筑之人，即呼为‘陈公新路’。”遗址中的主干道路应为文献中所记述的“陈公新路”，是连接淮安城和板闸的陆上官道。又据《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管家湖，望云门外。永乐初，平江伯于湖东北畔，界水筑堤砌石，自西门抵板闸，以便漕运，名谓‘新路’。”遗址目前所揭露区域向下仍有3~5层文化堆积，推测下部存在永乐时期“新路”及其相关遗存。新路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明代街巷类遗址，商业和社会生活气息浓郁，属于历史上河下镇的一部分，与河下地区的盐业活动背景密切相关。

板桥镇遗址

板桥镇位于淮安旧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闸而设、因盐而兴、因漕而盛、因商而旺的城镇。明初开凿清江浦运河时于河上建节制闸——板闸，板桥镇因此而得名。因其为南北舟车要道，宣德时又在此处设立户部钞关，最晚在天启年间已有板桥镇的建置，到清乾隆时由于钞关合并板桥镇发展到顶峰，商贾云集，市井繁荣，俨然大“城”景象。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钞关，板桥镇随之衰落。2014至2015年曾在此区域内发掘板闸遗址，清理出明代水闸、河道、建筑基址、河堤和码头等设施。

此次发现的板桥镇遗址位于淮安市生态文旅区，原属淮安市淮安区淮城板闸村，西北距板闸遗址约200米，同样整体处于黄泛堆积之下，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2021至2022年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院落基址43座、其他房址18座、道路18条、水沟3条、木桥2座、墓葬1座、古河道1处。

遗址内部建筑基址排列整齐有序，整体呈西北—东南向，以两条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L9、L11)及两条平行分布的主干沟渠(G1、G2)为轴，院落基址和房址等沿其边界排列，其余道路穿插于房址、院落之间，具有较强的规划性。排水沟则依道路和墙基处设置，水流汇入主干沟渠后向东进入古河道。建筑基址中规模最大的的一处可明确为《续纂淮安志》所记载的寺庙“如意庵”，采用砖砌墙体，寺庙范围内有僧人墓葬。其建筑墙体基本都为芦苇编织成篱墙，外侧用黄泥抹面，在文献资料中称为“淮屋”，属于淮安地区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出土各类器物共3000余件，有瓷器、陶器、金属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用具，生活气息与市井风尚浓郁。以各类餐具、炊具和厨具为大宗，另有少量装饰、祭祀、文房用品及建筑构件等。大部分器物出土时为集中分布，还有一部分被人为有意识地收集在铁锅、提篮、竹篓等容器当中。器物时代均不晚于乾隆时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在淮安老坝口决堤，洪水直冲板闸，《续纂淮安志》中有“及水退，平地积沙八九尺”的记载。结合发掘区上层的黄泛堆积，遗址保存现状和其中的纪年材料等信息，推测板桥镇遗址即毁于此时。遗址经历了扩张—废弃—重建三个阶段，时代为清代早中期，属于历史上板桥镇的东街区域。这是淮安继州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灾难性聚落遗址，其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分明，为复原清代早中期城镇的结构布局、社会风貌及居民生计活动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东晋时为控制泗水入淮之末口，于淮安建城，之后淮安城历经唐、元、明、清，一直作为州府治所存在，属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大运河历经开凿、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的全过程，始终与大运河密切相关。庆成门遗址完整反映了淮安城市的演变发展史，同时，作为沟通大运河与漕运指挥中心淮安城的主要通道，庆成门遗址还与漕河治理活动密切相关。新路遗址因运河漕运和沟通板闸与淮安城而兴起，其所在的河下，在盐务机构迁移后，成为淮北盐运的必经之地，遗址应与盐运活动存在着密切关联。板桥镇遗址曾因板闸钞关而兴盛，镇内居民“赖关务以资生者，几居其半”，与关榷收活动密切相关。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运河东岸，依托河道设施和公署机构，凭借漕运、盐运和关榷并集一隅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服务业，成为淮安大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群，生动展现了淮安运河沿线城镇因运而兴，因水而盛的历史过程，深刻反映了明清时期河道治理、水利变迁及人地关系演变，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城市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执笔:赵李博 胡兵)



新路遗址发掘区航拍(上北下南)



庆成门遗址发掘区航拍(上北下南)

残存的包砖及夯土

庆成门遗址发掘区航拍(上北下南)

庆成门遗址发掘区航拍(上北下南)